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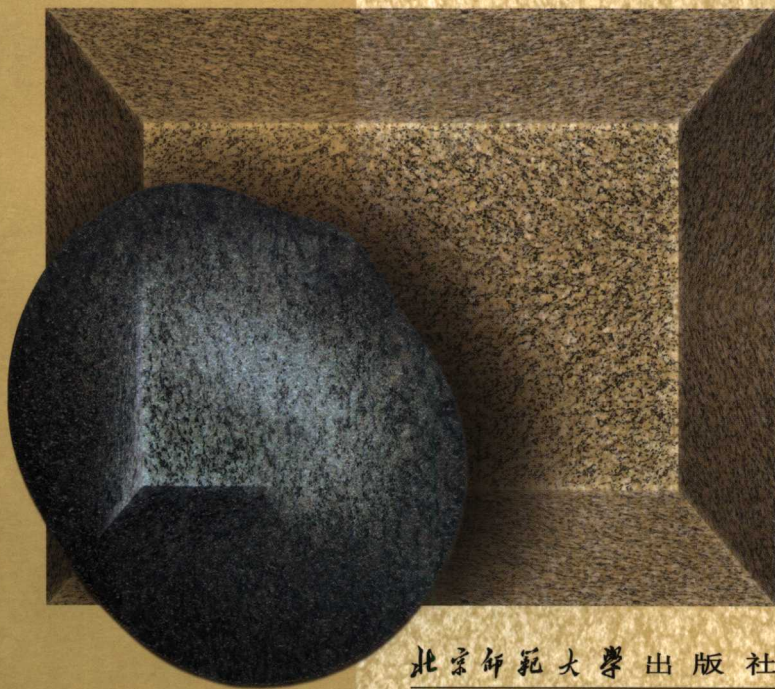
价值与文化丛书

袁贵仁 主编

自由与秩序

制度价值研究

邹吉忠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C912.3
Z967

价值与文化丛书

袁贵仁 主编

自由与秩序

制度价值研究

邹吉忠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 北京

DA Z35/0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由与秩序:制度价值研究/邹吉忠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0
(价值与文化丛书)
ISBN 7-303-06510-5

I. 自… II. 邹… III. 社会制度-研究 IV. D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7479 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出版人:赖德胜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80mm×1 230mm 1/32 印张:12.625 字数:340 千字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 000 册 定价:25.00 元

中文摘要

在社会的现代转型过程中，伴随着自由与秩序问题的凸显，制度成为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的基本问题。作者从社会现代转型的角度，以（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矛盾为中心线索，把制度放进马克思主义价值学的视野中，集中考察了制度在促进人的自由、形成自由秩序的过程中所具有的价值及其实现机制。作者认为，在以发展（核心是生产力的发展）为首要取向的现代社会，自由逐渐成为人们基本的价值取向；但从“自由及自由的扩展何以可能”的角度说，社会的秩序及其稳定是根本的前提条件，这就决定了制度建设对自由价值具有优先性。而且，在自由与秩序难题的各种解答中，相对于宗教解答、道德解答、市场解答而言，制度的解答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与此同时，我们不否认各种非制度的文化解答对于制度价值的补充作用，在廓清了制度架构的前提之下，我们将会形成对文化价值的重新认识，将会更清楚地看到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形成自由秩序的重要价值。

第一章在综合考察社会科学各学科制度研究材料的基础上，提出制度研究的价值学维度。作者认为，制度研究应该上升到哲学的层次，应该有一个价值学维度；同时，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哲学应该研究制度问题，以此来获得自己在理论上的新增长点。

第二章是本文的准备性分析，作者对制度的本质、结构和类型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考辨，认为制度是用以调整个体行动者之间以及特定组织内部行动者之间关系的、强制性或权威性的行为规则（体系），它具有完整的权力结构、合理性结构和效力结构。

第三章考察了制度演进的观念前提和实践基础。对制度的产生与演进而言，制度观念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主要表现为它为制度的产生与运作提供了价值定位和合理性论证，预制了逻辑框架，建立了价值评估体系。但制度的真正基础是制度实践而不是制度观念，人们之间的交往实践不仅产生了制度的需求，不仅是制度供给的主要渠道，还是制度实现其价值的基本途径，也是制度获得修正、渐趋合理的基本方式。制度演进过程虽然充满了不确定性，但也不是没有规律可循的。制度演进的基本规律有：从变迁方式看，制度变迁存在路径依赖与结构变迁两种基本形式；从变迁道路看，存在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两条变迁路线；作为一种集体行动，制度变迁还是制度观念与制度实践、理性建构与自然演进对立统一的过程。

第四、五章分别考察了制度在自由如何可能及自由秩序如何形成中所起的作用。作者认为，制度是自由可能的根本条件；而且，通过预期机制、激励机制、宽容机制和妥协机制的建立，制度成为自由秩序得以形成的社会机

制。一方面，制度是自由与秩序难题的基本解答方式，另一方面，自由与秩序的矛盾又是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基本动力，它有效防止了现代社会的制度僵化问题。

第六章是阐释了文化在解答自由秩序问题中的功能和价值，作者在现代制度的架构下，考察了以道德、宗教、艺术为核心的现代文化在解答自由与秩序问题中的作用及其机制。

第七章是本文理论研究的现实延伸。通过把中国界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前提下，作者提出中国社会制度建设的基本思路，认为中国制度建设应当实现从类推模式向创新模式转变，程序制度的建设是一个突破口，同时还要加强文化建设，提高人们制度创新的能力和素质。

ABSTRACT

In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al course of the society, which is accompanied by the prominence of liberty and order issues, institution has been the basic problem that each subject of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es. From the transformation angle and with (individual) liberty and (social) order as the central clue, this dissertation, considering instit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Axiology, concentrates on inspecting the role and mechanism played by institution in advancing person liberty and forming liberal order. The author thinks that liberty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fundamental value in modern society with development (the core is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as its first direction. However, from the angle of liberty and the possibility of its expansion, social order and stability are the preconditions, as a result, the construction of institution has logically priority over the value of liberty. In addition, among all the solutions to liberty and order problems, the solution to institution has priority over those to religion, morality and market. Although we do not deny the important complementary roles played by various non-institutions, only having a clear idea of the institution framework

can we explicitly recognize the cultural solution to non-institutions.

This paper consists of six chapters. Chapter one,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of the materials of institution research done by all subjects of social sciences, offers the hematological dimension of institution study. The author thinks that institution should be studied on the philosophical level, and their study should have a homology dimension; likewise, the Marxist Homology is supposed to study institution, so as to obtain its new growing point in theory. Chapter two is the preparatory analysis of the thesis, in which the author has systemically analyzed, and scrutinized the essence, construction and types of institution. He thinks that institution is the compulsory or authoritative rule or norm (system) that is applied to regulat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individual acts and those in particular organizations. In the author's opinion, institution has integrated authoritative, rational and effective constructions. Chapter three and four are the very core of the paper, which have inspected the role played by institution in how to make liberty possible and how to form liberty order respectively. The author thinks that institution is the essential condition that makes liberty possible. By setting up the anticipatory, encouraging, tolerating and compromising mechanisms, institution becomes the social mechanism that makes the liberty order formed. On the one hand, institution is the way of solution to liberty and order problems,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liberty and order is the basic motive force of institution change and innovation, which effectively prevents the modern social system from being rigid. Chapter five is the supplementary analysis to chapter four and fiv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modern social system, the author has inspected the role and mechanism played by modern culture with morality, religion and arts as its core, in solving liberty and order problems. Chapter six is the practice of the theory presented in this dissertation. Putting China in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model, the author has adduced the essential thinking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social institution, and thought that the construction

should be altered from analogical patterns to innovative patterns. The construction of procedure systems is a breach, in addi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e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the people's ability and quality of bringing forth to new ideas to institution should be promoted.

深入开展价值与 文化问题的研究（代序）

袁贵仁

最近几年，在我国理论界和现实生活中，有两个问题人们谈论得较多，一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问题，一是发展先进文化问题。这是两个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就是适应这种需要经教育部批准作为重点研究基地而产生的。中心成立的前前后后，有关同志围绕价值和文​​化问题作了一些探索，出版了一批论著。为进一步深入开展研究，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中心决定出版“价值与文化”研究丛书，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借此机会，我就价值与文化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谈一点看法，也权作序言，对这套丛书出版的原因、主题和目的作一点说明。

（一）

20世纪70年代以来，特别是自90年代开始，国内外学术界对价值观问题大感兴趣。“亚洲价值”和“世界伦理”的讨论，“文明的冲突”和“文明的共存”的争议，以及人权和主权的关系的辩驳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把价值观的问题凸显出来。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世界局势，进一步促进了对价值观的关注。一些学者不仅探讨价值观的理论问题，而且从价值观的角度理解

各种社会经济、政治问题，解释诸如亚洲振兴和亚洲金融危机，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第三条道路”的提出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等。

党的十四大就提出了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的问题。多年来，价值观的研究和教育，一直受到高度关注。社会的转型、开放和发展步伐的加快，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人们明显地感受到价值观的存在及其对社会进步的促进或阻碍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运行，其中的价值蕴含和价值期待，使人们的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明显增强。同时也要求在全社会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理想，反对和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增强全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人们看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中，隐藏于经济、政治、文化之中的理想、信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为人们确定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提供导向，为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自身提供动力，为评价人们活动的成败得失提供标准。邓小平同志“三个有利于”理论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既是新时期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也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所必须牢固确立的价值观。

(二)

人们对价值观的重视，是因为价值观的重要。

价值观是人的主心骨。人是社会动物，价值观是人的

社会化的核心内容。人的社会化过程、价值观的形成和主体性的获得，这是一个问题的三个不同侧面。所谓社会化，就是指个体在社会中学习知识和技能，适应他所在的社会或群体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过程。每个新生儿的生物潜能都是非常广泛和不确定的，任何一个社会都不会不加引导而任其发展。在他们尚未成熟的漫长岁月里，他们的冲动和能力逐渐被引导到一定的社会模式里，将社会价值观内化，使他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成员而存在。

人也是文化动物，个人的成长、社会化过程就是不断接受、消费社会文化，由生物人变为文化人的过程。接受文化的结果，就是一定行为方式的获得，也就是一定的价值观的掌握。因为一切行为方式的深层和背后都是一定的价值观念。它构成文化结构的核心内容，具有极强的辐射力和穿透力，不仅影响人们做什么，而且影响人们怎样做，以及为什么做。

因此，人的价值观和人的行为是互动的。一方面，人的社会行为是其价值观形成的基础，另一方面，人的行为又都是在一定的价值观的指导下形成的，人的行为及其方式的变革取决于价值观的变革，价值观是人的行为及其方式变革的前导。美国未来学家、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说：价值观和道德伦理上的变革会推动人们去改变他们的社会安排和体制。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每一次社会大变革总会有一场思想观念领域的大论战，伴随着价值观念的大讨论。

心理学的研究证明，明确而坚定的价值观的有无是区

分一个人心理是否成熟、人格是否健康的重要标准。个人是这样，群体也是如此。民族和国家的价值观，决定着民族心理的成熟和国格的健康。

价值观是组织的黏合剂。人需要认同，价值观是人们认同的核心内容。人作为社会动物，组织是其存在和活动的形式，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源泉，获得一切成就的主要因素。组织的建立、维系和作用依赖于组织成员价值观的相容和一致。每一组织、群体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它造成一种气氛，形成一种力量，并通过多种渠道，使这种观念在个人心中内化，成为每一个人的价值观。任何组织的品质和业绩，早先决定于创办人的价值观，后来则决定于整个组织的共同价值观。

这种共同的价值观，是社会交往的中介，它为社会群体及个体成员间复杂的交往、交换提供一套共同的标准和调节手段，是个人行为的调节剂。这种价值观，构成每一个体的心理定势，使人们在其现实生活中，以它为尺度去量度、评判、裁定现实事物和现象，审视实际生活。也就是将现实事物、现象与价值观相对照，进行价值评价、情感体验，做出情绪反应和态度表示，确定哪些事物是好的或不好的，哪些行为是正当的或不正当的。对好的事物、正当的行为采取趋近的态度，对坏的事物、失当的行为采取疏远的态度，从而鼓励、强化正当活动，抑制、纠正失当行为。

这种共同的价值观，对集体中每个成员具有感召作用和凝聚作用。这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它在整个组织团结合作方面所起的作用，比任何有形物所起的作用都要大。当

前人们正在研究和倡导的“企业文化”、“大学文化”，主要就是通过管理者在企业、大学中坚持正确的价值观教育，使它渗透到每个人的思想意识之中，指导、调整个人日常行为，协调、规范集体的行动。

价值观是活动的指示器。人的活动具有选择性，价值观决定了活动的价值取向。在认识中，人不是信息的被动接收器、贮存器，而是有选择地接收对自己有用的信息。现实世界有各种各样的信号作用于人，人们首先和着重认识什么，他实际能够认识什么，一个重要的方面取决于人们的价值观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对于客观事物的态度。在决策中，目标的确立，最能表明决策者的价值观。目标是人所期望达到的未来状态。一个事物，只有当它被认为是有价值的，能满足人的需要的时候，才能成为积极争取的目标。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目标。人的实践活动的方向和方式，以及活动工具的选择和活动结果的形成，无不渗透着个人的价值观，打上个人价值观的烙印。

当然，有选择就有舍弃，正像有光明就有黑暗一样。一种价值观提供了一种视域，同时也就产生了一种心理盲点，提供了一种可能，同时也就排除了另一种可能。

人们最近几年对价值观特别重视，是因为我们面临着特殊的形势。一是人们交往范围的扩大和频繁，由“熟人世界”逐步过渡到“陌生人世界”；二是社会变革力度的加大和发展速度的加快。大家知道，在一个相对固定、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里，某一价值观为大家所共享，它畅通无阻，被当做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东西，极少引起注视和反思。就像衣服穿得合身了，人们就不感到衣服是个负

担，不那么时刻关注自己的衣服；空气新鲜，人们就忘了包围着自身的空气的存在；呼吸器官没有毛病，也就不注意自己是怎样地呼吸的。人们的价值观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只有当我们周围的社会环境发生了迅速的、巨大的变化的时候，才开始感到自己信奉的某种价值观的存在，才开始注意到还有其他价值观的存在，才有了价值观的比较和鉴别、借鉴和拒斥，从而也开始了价值观的兴趣和研究。

(三)

那么，什么是价值观呢？

价值观是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哲学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哲学理论转向社会实践的主要环节之一。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的统一。价值观属于世界观和意识形态。哲学不同于一般科学，它力图从人的生存、享受、发展的角度出发，把握人与自然、社会、自身的关系，把真、善、美统一起来，把知识和信仰统一起来，把理性和非理性统一起来，为人的活动提供理想、信念和价值导向。

从字面意义上讲，对“价值观”的理解主要取决于对什么是“价值”和什么是“观”的理解。“观”和一般的认识、知识不同，它是一种观点，或者叫看法、态度。世界观是人们关于世界的观点、看法、态度，人生观是人们关于人生的观点、看法、态度。那么，什么是“价值”呢？价值即意义，某事情对人有意义，就是有价值；意义的大小，也就是价值的大小。说得再通俗一些，价值即作

用，某事物对人有作用，也就是有意义、有价值，作用的大小，也就是意义、价值的大小。概括起来，所谓价值观，就是人们关于某种事物对人作用、意义、价值的观点、看法和态度。

人的价值观不是孤立存在的，作为一种观念，它是人的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所说的世界是包括人在内的，是以人为中心的，由自然、人、社会构成的。世界观作为人们的总观念，包括自然观、历史观、人生观。世界观和人生观是包含关系，不是并列关系。而世界观，或者具体说自然观、历史观、人生观，本身都是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我们讲价值观，就具体包括自然价值观、历史价值观、人生价值观。这主要是从人的活动客体（自然、社会、人自身）的角度讲的。价值观作为观点、看法、态度，总是一定的人的观点、看法、态度，如果从主体的角度讲，从是谁的观点、看法、态度讲，价值观又可分为个人价值观、集体（家庭、民族、阶级阶层、政党）价值观、国家价值观和人类价值观。

世界观作为人们对整个世界的根本看法，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世界面目的根本观点，它回答“世界是什么”的问题，属于真理观；二是关于世界价值的根本观点；主要回答“世界怎么样”的问题，属于价值观。人生观也是这样。理想的人生既要是科学的，也要是好的、有价值的，既包括真理观，也包括价值观，即人生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生价值观是价值观的一个领域，同自然价值观、历史价值观并列，是人生观的一个方面，与人生目的、人生态度并列。也可以说，人生价值观是人

生观中的价值观，是价值观在人生中的表现。它回答什么样的人生是好的、有价值的，或者说人应该怎样活着才有意义、有价值。

因此，价值观和世界观、人生观也是包含关系，而不是并列关系。现在，我们之所以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并提，强调“三观”教育，主要是根据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突出世界观中人生观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世界观、人生观中价值观的地位和作用。

既然“观”是一种观点、看法、态度，那么，正如同真理观和真理不同一样，价值观也和价值不同。真理是指正确的认识，真理观是关于什么样的认识才是正确或不正确认识的看法、观点。符合客观对象的认识，这是真理；符合客观对象的认识是真理的看法，这是真理观。价值是指事物的好坏，价值观是关于什么样的事物是好或坏的看法、观点、态度。人们对某人、某事、某物好坏的评价不同，根本上是因为人们对什么样的人、事、物是好或坏的看法、观点不同。

真理观指导人们发现真理，从客观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价值观指导人们发现价值，从人的目的出发，按人们的需要办事。真理观和价值观，这是人的世界观（自然观、历史观、人生观）中的两个组成部分，人类活动的两个尺度。人类的任何一项社会活动，只有遵循两个尺度，既合规律又合目的，才会真正去做，去实践，也才可能取得成功。大家都知道，不合规律的事，肯定不能做。但合乎规律的事，也未必去做。日常生活中有许多事情是合乎规律的，但人们并不实际去做。譬如，人不吃饭